

吴永贵著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民国出版史

永贵著

民国出版史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国出版史 / 吴永贵著.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1.6
ISBN 978-7-211-06265-2

I. ①民… II. ①吴… III. ①出版工作—史料—中国—民国
IV. ①G239.29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04095号

民国出版史

作 者: 吴永贵
责任编辑: 雷 戎
装帧设计: 后声文化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地 址: 福州市东水路76号 邮政编码: 350001
网 址: <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 211@fjpph.com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 41.75
字 数: 790千字
版 次: 2011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1-06265-2
定 价: 80.00元

G239.296
8

序

民国时期是距离我们最近的一段“大历史”，政局上的多变和文化上的多元，都有着与前朝后世不尽相同的状貌。出版作为一种政治舆论的空间，学术文化的载体，以及国民经济的产业，亦有许多为后人之乐道，甚至感到难以企及的地方。所谓某朝某代历史之“大”，其实有时并不在于它时间之长短，而在于它的多面与多元，在于它为后人作未来憧憬和假设时，有较为丰厚的矿脉资源可供开掘。近些年学术文化界的“民国热”，自有其历史和现实的根据。前些年出版史学界组织撰写《中国出版通史》，“民国卷”列为九卷之一，理路上原本也是相通的。

出版作为一种文化产业，总是在时局的变化中载沉载浮。晚清以降的中国，外忧内患不断。民国新朝乍立，国家社会，依然两不太平。至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国家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政局进入了相对稳定状态以后，民国出版业才迎来了一短暂的佳绩时期，机构涌现，人物辈出，出版物量、质两方面，都很可观。不管是十里洋场的上海，还是文化古都的北平；不管是国民政府中枢所在的南京，还是南、北两重镇的广州与天津，均在这十年中，进入各自出版区域的高峰时期。而之前因军阀割据，出版布局难以从容；之后因抗战爆发，出版生产力遭遇重创，在向后方的被迫转移中，虽然也出现了重庆、桂林、永安等出版新据点，但已与昔日以上海为中心，以北平、南京、天津、广州为次中心的出版业，难以同日而语。要把握民国出版业的发展历程与区域变迁，需要纳入到民国政治格局中，才好理解。

出版作为一种媒体，蕴含着思想，肩负着文化，承载着知识，与时代思想文化变革保持同调。当五四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民主与科学的价值观念，借助于书报刊的传播力量，一时备受国人瞩目，在激发人们对新知识、新思想、新文化学习热情的同时，也带动了出版业自身的飞跃式发展。新文学出版物、学术性图书、儿童读物以及诸多普及性的百科丛书，都在新的需求下，催生催长起来，从而丰富了出版物类型，改变了出版物学科结构。而作为五四成果的白话文主流地位的正式确立，以及标点符号的广泛应用，亦使五四以后的出版物语言形式应声而变，阅读不再是少数精英阶层

的专利，成为了大众生活的日常内容。阅读的普及反哺了出版业的发展，需求因之拉动，市场因之扩容，说五四是民国出版的另一个高点，原因即在此；说出版与文化，共生与共长，亦能从中找到最有力的证明。

民国离乱时代，却出书出人，大师辈出，名著不断，人们在总结其原因时，几乎都要提到那个时期的出版制度。在民主共和的时代大前提下，民国时期的出版自由观念，同样有着深厚的思想文化基础，不容轻易践踏。国民政府在 30 年代中期和抗战时期施行的书刊审查制度，都曾受到出版界和文化界的声讨和抵制。事实上，查禁与反查禁的斗争，总是交织在一起，贯穿着民国出版过程的始终。而这两股力量形成为抗衡之势，为思想学术的发展，提供了发布成果的空间，也为各社团阐扬宗旨，为各政党争取民众，提供了施展拳脚的可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出版事业，在困局中求生存谋发展，显示了极高的政治智慧和顽强的生命力，颇耐人寻味。

民国时期究竟有多少家出版机构，现在还没有准确的统计，有人说可能达上万家。出版进入的低门槛，和出版高风险下的低存活率，是造成出版机构众多的两大主要原因。文化团体、政治党派、官府主导、商业民办，共同构筑了民国出版主体的多姿多彩。若从产业规模和文化影响来说，民国时期担纲起出版主角的，是那些纯粹走市场化路线的民营书局。这是一条重要的出版主线，从清末发展而来，到民国臻于成熟，形成了十分可观的出版产业。资产规模前五位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均是股份制形式的民营书局。他们在市场为主导的出版环境中，审时度势，关注对手，把握商机，锐意经营，终于做大做强。这样的出版生态，有的是竞争，少的是垄断，靠市场配置资源，凭实力排名座次。要想在对手如林的出版领域一直保持领先，做到青山不老，出书就不能不格外严肃认真。许多好书、大书，出自大书局之手，固然有其雄厚实力作依托，背后的现实原因可能还在于，大书局比小书局，更需要爱惜羽毛，更需要关注长远。因为，所谓出好书，所谓出版讲社会效益，在长远目标统摄之下，就不是一句应景的空话，其最终都会通过读者的口碑，以及前期种下的良好社会声誉，转化成了长远的经济效益。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出版物质量的好坏和市场化运作程度的高低，并不两相冲突，更不彼此背离。

在民国时期的出版生态系统中，数量更多的还是那些中小书局。由于竞争激烈，多数忽起忽灭，不为后人所了解，但也有不少中小书局的名字在新文学史和近现代教育史上，反复被研究者们提起：新潮社、北新书局、亚东图书馆、泰东图书局、文化生活出版社、上海杂志公司、现代书局、光华书局、黎明书局、新月书店、真美善书店、创造社出版部、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儿童书局、神州国光社、勤奋书局等。他们往往抓住某一历史机遇，连接上与时代契合的出版端口，出版了许多大书局不能出、

不敢出或不愿出的新书刊，在市场的夹缝中谋取生存，在文化的浪尖上剑走偏锋，居然为自己的出版开拓出一片新天地，也为文化的发展贡献出一片新领域。“小”书局也能释放出“大”能量。

出版作为一个行业，从策划选题、组织作者、审读加工，到装帧印刷、宣传销售等环节，一路流程下来，所表现出来的专业性，是写作者个人力量做不好甚至做不了的。正因为如此，出版就不仅仅是一个为“他人作嫁衣”的文化传播工具而已，它还挟带着“专业”赋予的无形抓力，对文化的生产方向和生产方式，必然地要表达着不可小视的传播话语权。怎么出书，出谁的书，出什么样的书，与编辑出版者的眼光、才情、境界大有关系，在最终的文化成果清单里，其实都带着编辑出版者的印记，或隐或显，或大或小，或好或坏。我们称张元济、王云五、陆费逵、邹韬奋等为出版大家，是因为他们曾给予那个时代的文化，以大的好的杰出的影响，还不仅仅因为他们做成了了不起的文化产业而已；我们记下鲁迅、巴金、胡适、茅盾、顾颉刚、徐志摩等人的出版事迹，是因为他们在出版领域的进退出入，曾为那个时代的出版，涂抹上鲜亮的文人学者色彩；我们书写沈知方、张静庐、沈松泉、汪孟邹、汪原放、伍联德、赵家璧、张竞生等人的出版故事，是因为他们自有某种出版精神气质，叫人不由自主地为之感慨。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不数年，出版社实行公私合营，民国时期旧有的出版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历史毕竟是前接后续，无法完全割裂的。且不说民国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出版事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业的源头；民国出版业积累下来的出版生产力，是国家新政权成立后各项出版活动开展的重要人力物力基础；就是民国时期市场主导的经营运作方式，亦可成为当前出版体制改革和产业化发展背景下可资取法的重要历史资源。这样一种历史与现实的对接，使民国出版史的研究多了一层学术之外的现实意义。

本书作者吴永贵教授，1994年负笈珞珈，在武汉大学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所教即为所学，教研相长，又勤奋用功，时有文章发表。几年前，《中国出版通史》课题组邀我主持民国卷的撰写，他主动要求参加，担任了书稿撰写的主力。这次他应福建人民出版社之约，独立完成了七十余万字的《民国出版史》，调整体例，增损内容，更换篇章，特别是摒弃报刊不论，为一纯粹的书业史，这都是与《中国出版通史·民国卷》大不一样的地方，不仅仅是增加字数而已。乐为之序。

王余光

2010年末于京西畅春园

目
录

第一章 晚清时期出版业的近代化转型

- 一、教会出版与新式出版的开篇 3
- 二、洋务派译书与新式出版的官办 10
- 三、民营出版机构的崛起 15
- 四、民营新式出版业主体地位的确立及其意义 19
- 五、出版业近代化转型因素（上）：近代出版技术的引进与应用 25
- 六、出版业近代化转型因素（下）：出版业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与改善 29

第二章 民国时期出版业的发展历程

- 一、五四新思潮下的出版变革 45
- 二、民国出版业的黄金十年 54
- 三、抗战时期出版业的衰落与出版人的文化努力 61
- 四、战后出版业的重建与挫折 71

第三章 民国图书出版的学科分布与区域布局

- 一、图书出版物的学科分布 77
- 二、上海，全国出版的中心 86
- 三、战前的几个出版次中心城市 94
- 四、抗战时期的出版新据点 103

第四章 民国时期先后出现的七大出版机构

- 一、商务印书馆 111
- 二、中华书局 120
- 三、世界书局 127
- 四、大东书局 131
- 五、开明书店 134
- 六、正中书局 138
- 七、贵阳文通书局 142

目 录

第五章 其他有影响的中小书局

一、新潮社	149
二、北新书局	152
三、亚东图书馆	158
四、泰东图书局	161
五、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165
六、文化生活出版社	169
七、上海杂志公司	173
八、桂林文化供应社	178
九、永安改进出版社	183

第六章 大书局重要出版人物列传

一、张元济：在出版业中安身立命	193
二、王云五：杂家做成大出版	197
三、高梦旦：备受朋友怀念的出版智者	201
四、陆费逵：人格力量辅佐出版管理	205
五、舒新城：《辞海》出版的功臣	211
六、黎锦晖：且歌且舞且编书	215
七、钱歌川：文学生涯从中华书局开始	220
八、沈知方：纵横书业的经营奇才	224
九、章锡琛：可敬的精明与气度	228
十、夏丏尊：不改教育家本色	232
十一、叶圣陶：“开明风”的代表者	236
十二、华之鸿：创文通书局留香西南	239
十三、曾在书局供职的编辑出版人传略	243

第七章 其他编辑出版人物列传

一、鲁迅：真为文艺尽力的高明编辑	261
二、巴金：多年不拿分文报酬的义务总编辑	264
三、张静庐：四马路出版界的霸才	267
四、沈松泉：于新书业有功之人	275
五、汪孟邹：出版行走于文化风云人物之间	281
六、汪原放：标点校勘古典小说第一人	285
七、伍联德：一个创业青年的书业传奇	289
八、赵家璧：邀约名家书稿的能手	293
九、张竞生：既开风气也为先	297
十、其他编辑出版人物传略	302

第八章 编辑出版工作

一、选题与组稿	321
二、装帧与印刷	325
三、发行渠道与发行方式	332
四、推广与宣传	338
五、非主体出版物市场	361
六、书评活动	369

第九章 书业经营与管理

一、组织形式	375
二、机构设置	380
三、人员构成	385
四、制度管理	390
五、融资方式	400
六、多种经营	405

目 录

第十章 出版法律与出版管理

一、各时期《出版法》的制定	415
二、书刊查禁的层出不穷	421
三、原稿及教科书的预先审查	424
四、各时期《著作权法》的颁布	428
五、各种类型的版权纠纷	432
六、书业同业公会组织的出版管理	437

第十一章 教科书出版

一、教育变革与教科书出版商机	445
二、审定制与部编制	451
三、出版竞争与教科书进步	456
四、教科书的快编快改与多级多元	465
五、高等教育的发展与大学教科书的编印	473

第十二章 各类型图书的出版

一、古籍的出版	481
二、工具书的出版	486
三、儿童读物的出版	493
四、丛书的出版	503

第十三章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出版业

一、中国共产党出版事业历程	509
二、中国共产党出版机构	520
三、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与新知书店	548
四、邹韬奋、徐伯昕、胡愈之列传	556
五、中国共产党编辑出版人传略	5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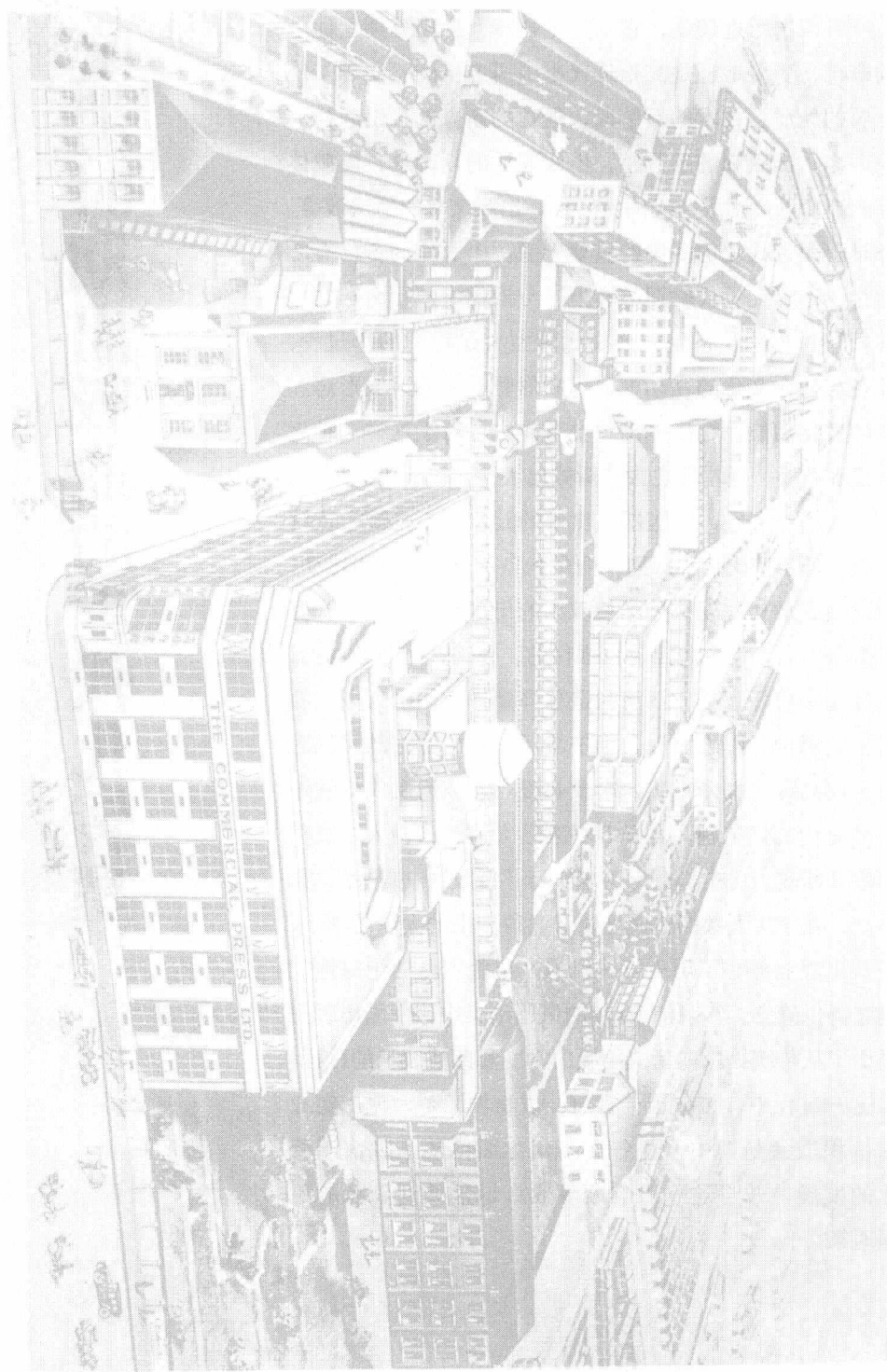
目
录

附录 有关出版法律法规及书业章程

一、出版法	583
二、出版法施行细则	588
三、著作权法	591
四、著作权法施行细则	595
五、上海市书业同业公会业规	597
六、上海市书业同业公会章程	604
七、教科图书及其他图书划一出售办法	610
八、上海市书业同业公会为划一图书售价办法公告	612
主要参考文献	629
后记	651

所谓出版近代化，它不完全是一个历史分期层面上的概念，更多地还是寓指近代出版所产生的不同于传统出版的新质。技术的新手段，经营的新方式，出版物的新内容，出版观的新调整，出版职业的新确立，出版体制的新变迁，出版布局的新转移，出版文化的新递演等，都是出版近代化内涵中的重要元素。出版作为古已有之的行业，它在近代时期的转型，与近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过程同步，是社会文化转型大过程中的小过程，并在与社会文化的互动中，不断形塑出新的产业形态和新的文化功能。在诸多出版史著作中，对于这样一种近代出版新质，通常称之为“新式出版”。

从历史上看，中国新式出版的起步，不是源于传统出版内部条件的自身成熟，而是来自于外力的强力推动。新式出版最初发轫于外国传教士的出版活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出于自强目的，被迫开展洋务运动，京师同文馆译书处、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等国人办的新式出版机构，因之而起。甲午战后，救亡图存的民族思想空前高涨，编译出版西学新书报刊，成为戊戌变法期间的时代文化主题，日译西书因之大量转口输入，民营出版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清末实行“新政”，废科举，兴学堂，在学生人数的迅速增长和教科图书的大量需求下，民营出版业抓住了历史发展机遇，出版主体的绝对地位因之得以确立。在晚清 70 年的风雨沧桑中，中国出版业经历了从传统出版向新式出版的嬗变和此消彼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传教士、官府、改良派、革命派、实业家都积极参与其中，从各个不同方面推动了晚清出版业的发展，并将这一影响顺理成章地延伸到随后的民国时期。



路山寶海上 景全廠造製刷印

一、教会出版与新式出版的开篇

早在 1840 年鸦片战争以前的 19 世纪前期，西方传教士出于传教的需要，就在中国沿海及附近的海外其他地区，开办了一些教会中文出版机构，但由于当时清政府的禁教政策，教会中文出版机构还只是处于萌芽状态。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不平等条约的订立，曾经被拒之门外已久的西方教会势力卷土重来。纷纷涌入中国大陆的外国传教士，开始活跃于通商口岸，并以这些较为开放的沿海、沿江城市为桥头堡，向中国广大内地宣扬基督、布道福音，进行宗教辐射。但是面对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中国，单凭传教士们深入民间聚会演讲，收效甚微。长期的闭关锁国，形成了中国社会对外国人天然的抵拒心理，儒家文化也是一道坚厚的阻挡屏障。传教士在苦恼之余，开始自觉地调整传教策略。

具体措施包括：办报纸、出书籍、建学校、设医院等。尤其是建立出版机构，更是传教士们作为打开传教局面、征服中国人思想的重要手段工具。美国传教士玛卡雷·布朗（Macalady Brown）的表白，就明确地反映了这种心理。他说：“单纯的传教工作是不会有多大进展的，我们还有一个办法，一个更迅速的办法，这就是出版书报的办法。”^①他们认为通过出版物可以最大限度地影响中国人的思想，“别的方法可以使成千的人改变头脑，而文字宣传则可以使成百万的人改变头脑”，“介绍福音知识的最好手段，乃是印好的传单和书籍”。^②

据不完全统计，传教士在 1895 年以前，先后成立的出版机构有 18 家。到 20 世纪初，在全国各地增至 70 余处^③，其中以墨海书馆（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Press）、美华书馆（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土山湾

① 江文汉：《广学会是怎样一个机构》，《出版史料》，1988 年第 2 期。

② 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22 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年。

③ 周其厚：《传教士与中国近代出版》，《东岳论丛》，2004 年第 1 期。

印书馆、广学会(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等4家出版机构最为有名。

墨海书馆 鸦片战争以降,最早在中国设立的教会出版机构是上海的墨海书馆^①。书馆系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Henry.Medhurst)创办,经费由英国伦敦教会资助。墨海书馆前身是设在爪哇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的印刷所,1843年迁移上海,先后由麦都思、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和艾约瑟(Joseph Edkins)主持。墨海书馆的印刷设备,由麦都思从南洋带来。使用中文活字,初用手摇,到了1849年,改用机器印刷,以牛拉为动力,效率大为提高,几小时能印几千页纸。机器印书,已属奇事,用牛拉转,更为新鲜。海上文人以诗咏之:“车翻墨海转轮圆,百种奇编宇内传。忙杀老牛浑未解,不耕禾陇种书田。”^②

该馆当时主要印刷《圣经》和其他宗教小册子。自1850年开始印刷部分科学书刊。在1844—1860年间,共出版171种书刊,其中宗教书刊占80.7%,各种科学书刊占19.3%。出版的数学书籍有:1853年出版伟烈亚力主译的《数学启蒙》2卷,1857年出版伟烈亚力与李善兰合译的《续几何原本》,1859年出版伟烈亚力与李善兰合译的《代数学》13卷、《代数积拾级》18卷,后者是近代中国第一部高等数学译著。在物理学方面,1858年出版伟烈亚力与王韬合译的《重学浅说》,此书虽只有14页,却是近代中国第一本介绍西方力学的书籍。第二年又出版了艾约瑟与李善兰合译的《重学》,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力学的内容。在天文学方面,1859年出版了伟烈亚力与李善兰合译的《谈天》18卷,是关于西方天文学的学术著作,在近代中国学术界有很大影响,梁启超曾在《读西学书法》中评价该书“最精善”,“不可不急读”。^③在植物学方面,有1859年出版的《植物学》8卷,此书是中国第一部介绍近代西方植物学的著作,奠定了中国近代植物学产生和发展的基础。在医学方面,有1857—1858年间出版的英国医生合信(Benjamin Hobson)著、管嗣复译的《西医略谈》《妇婴新说》和《内科新说》。1857年1月该馆创办《六合丛谈》月刊,由伟烈亚力主编,内容为科学、文学、新闻和宗教等,是近代上海第一份综合性中文杂志,也是中国最早铅印出版的杂志之一。

该馆除《圣经》等宗教出版物和《六合丛谈》采用活字铅印外,其他书籍仍采用

① 墨海,在中文典籍中,原意是大砚、墨盆,作为出版印刷机构,以此命名,倒也很符合。此外,麦都思以“墨海”命名,很可能与他的姓氏有关,“Medhurst”与“墨海”读音相近。

② 孙次公:《洋泾浜杂诗》,转见熊月之、张敏:《上海通史·晚清文化》(第6卷),11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③ 梁启超:《读西学书法》,3页,1896年石印本。

雕版印刷。1860年以后,美华书馆迁来上海后该馆停业。

美华书馆 美华书馆前身是1844年美国基督教(新教)长老会在澳门开设的花华圣经书房,1845年迁往宁波,1860年迁至上海,改名美华书馆。书馆主要出版《圣经》和宗教书刊及供教会学校用的教科书,还印刷出版了几十种自然科学书籍。1879年出版的《英字指南》是中国近代最早的英语读本,1886年出版的《万国药方》是中国最早介绍西洋医药的译本,1898年出版的《格物质学》是自然科学常识教科书,《代形合参》《八线备旨》则是数学教科书。还有《心算启蒙》《五大洲图说》《地理略说》等被作为教会学校教科书。玛高温(Daniel Jeromre MacGown)、郭实腊(karal Friidrich August Gutzlaff)等传教士对此馆译作的出版,厥功甚伟。

由于美华书馆在印刷技术上应用了姜别利(william Gamble)的两项发明,大大提高了印刷质量和效率,迅速发展成为当时上海规模最大、最先进的活字排版、机械化印刷的印刷机构。书馆从宁波迁到上海时有5台印刷机,到1895年已有滚筒印刷机4台和平台印刷机1台、大型手动印刷机4台、汽轮机1台。1902—1903年间,在北四川路又扩建了1所印刷厂,设有排字、印刷、装订、浇铸和照相制版等车间。工作人员从创立时2名印刷工人和1名排字工发展到1917年的200名工人。1923年出盘给商务印书馆。^①

土山湾印书馆 该机构19世纪60年代开办于上海徐家汇,至1869年,已拥有70多种宗教类书籍的木版。1874年,开始引入活字铅印技术,同年,设立石印部。先后出版《益闻录》《格致益闻汇报》《圣心录》《圣教杂志》等刊物。1875年引进珂罗版,印刷圣母像等图片。1894年,成立照相制版部,最先把照相铜锌版设备和技术引入上海。工人多至130人,每年出版中西文书刊百余种,是中国天主教最早、最大的出版机构。^②

该馆主要出版宗教书刊、经本、图像、年历、教科书以及中、英、法、拉丁文书籍。此外,还承印法租界工部局的文件、报表、通告等,印制一些附有地图和照片的有关中国气象、地质、水文、风俗民情的著作、资料。出版的有关西方科学的书籍主要有:《形性学要》《西学关键》《几何探要》《透物电光机图说》《五洲图考》《公额小志》《墨澳觅地记》《物理推原》等。该馆还出版《中国学丛书》《扬子江上游图》《江苏省份图》等,不公开出售,制成后寄往国外有关机构。

^① 《上海出版志》编纂委员会:《上海出版志》,222~223页,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

^② 《上海出版志》编纂委员会:《上海出版志》,224页。

广学会 在近代中国出书最多、影响最大的教会出版机构当属广学会。广学会创立于1887年的上海，初名同文书会，1894年易名为广学会。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先后任广学会总干事，其成员主要有林乐知（Young J. Allen）、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艾约瑟、丁韪良（William A. P. Martin）、李佳白（Gilbert Reid）等人。

广学会历时70年，在不同时期的工作宗旨、活动特点、社会影响差别很大。其介绍西学最多，对中国社会影响最大的是1900年以前，尤其是戊戌变法时期。据台湾学者王树槐估计，1887—1900年，广学会共出版书籍约176种；至1911年，共出版461种。这些书籍中，纯宗教书籍约138种，占总数29.93%；非宗教性书籍约238种，占总数51.63%；含有宗教意味的但也含有其他内容的书籍约85种，占总数18.44%。

广学会编印了《万国公报》《中西教会报》《大同报》等多种报刊，最有名的是《万国公报》。其中，《孩提画报》《训蒙画报》《成童画报》均为儿童读物，这些画报内容浅显有趣，图文结合，颇受读者欢迎，年销量最多的达35000多份。出版的图书中，畅销全国的不少。《泰西新史揽要》1895年首印3万部，还是供不应求，只得一版再版。1898年增出普通版，初印5000本，一出来，两星期里就卖出4000本。各地书商见有利可图，纷起翻刻盗印。据称，在杭州，有6种翻版；在四川，至1898年就有19种翻版。其他如《中东战纪本末》《格物探原》《自西徂东》和《文学兴国策》等，都有相当大的销量。

这些书刊在内容选题上，结合中国实际，介绍世界历史、地理、国际交往常识、各国教育概况、近代文明发展状况；提出诸多变法建议，如兴学、办报、游历、采煤、冶金、兴建铁路、开办银行、改进税收、奖励工商、开设议院等；注意从价值观、历史观、生活方式、伦理道德方面对中国文化问题进行讨论。广学会出版物这种研讨问题的广博性，以及视角独特的新颖感，深受中国读者的欢迎，对中国近代思想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王韬、孙中山都是《万国公报》的作者，康有为在出名前便参加过广学会的有奖征文，梁启超担任李提摩太秘书，光绪皇帝订购广学会书刊多种。这些都是人们熟知的事实。我们从名目繁多的时务通考，新学汇编，经世文续编、三编、四编、五编、新编中，从灿若群星的维新思想家的危言、庸言、通议、平议的变法著作中，随处可见广学会出版物的影响。^①

^① 熊月之、张敏：《上海通史·晚清文化》（第6卷），163～16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